

现在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，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。另一方面，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，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。

原因很简单，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。穷人是弱势群体，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。哪怕说错了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立场不错，顶多是技术性错误。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。立场错了一切都错，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，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。

为富人说话则不同。由于民众受传统的影响，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——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，帮富人说话肯定也是不受欢迎的。所以话还没有说，立场就已经错了。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？

至于做事，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，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。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，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。结果，许多人为富人做事，为穷人说话；很少人为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做事。这样一个社会是很正常的，是容易出问题的。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，为富人说话，为穷人做事。

先要说明，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、以权谋私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，而是指诚实致富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。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，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，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，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。中国穷了几千年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——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，被剥夺，被侵犯。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，并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“文革”结束这段时期。其结果大家知道，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。谁也不敢变成富人，万一变成富人，不但自己被整被斗，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，不能参军，不能入党。幸亏邓小平提出来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这才打破了僵局。现在有人批评这个政策，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。

我为富人说话，遭到猛烈的批评。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，我更觉得有保护

富人的必要。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，再次剥夺他们。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，反对保护富人，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。当然，我不仅为富人说话，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。不过正如前面所说，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。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。其实，我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，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。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。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，穷人还有前途吗？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，先打倒富人，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。这对某一个人来讲

富。这固然不错，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也创造财富。改革开放之前也有工人农民，为什么财富那么少？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，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。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、资本、技术、市场等要素，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，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。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，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。他们虽然是为了赚钱，但在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。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？

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。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。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，有病时有钱看病，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，或能进城打工，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。

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，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。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，哗众取宠，说话最终对穷人不利。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，宣传富人有罪，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，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。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，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，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，要求大学降低学费，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，让穷人上当受骗。这些问题一时难以搞清楚，但是为富人说话、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。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！

南方都市报（茅于轼）

经济学家茅于轼在《南方都市报》撰文

富人穷人 都应受保护

的确很理想，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。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。这就是人权。

穷人容易受欺侮，受压迫。这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，受剥夺。这大家未必很清楚。

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。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，当企业家容易吗？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，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，给他们上贡，请吃饭，陪娱乐，说好话，低三下四地做人。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，风险最大的，负担最重的。在执业中稍有闪失，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，没有协调好“黑社会”的关系，立刻灾难临头，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，在一个政策多变的环境中，战战兢兢做事。但是，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。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，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。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。人们常说，工人农民创造财



世界哪个城市居民最诚实

用是否归还手机检验全球 32 座城市，斯洛文尼亚首都排第一，多伦多、首尔分列二、三

广州日报 美国《读者文摘》杂志最近在全球 32 座城市进行一项考验城市居民诚实度的测试——测试者故意把手机“丢失”在街头，看看哪些城市的居民在捡到手机后会诚实地把手机交给失主。测试结果显示，最终有 68% 的手机物归原主，其中数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居民最诚实。

《读者文摘》的工作人员在全球 32 座城市的数十个繁华的公共场所里，共放置了 960 部中等价位的新手机，然后由躲在附近的工作人员致电手机引起行人的注意，观察行人是否会接听电话，以及如何处置捡到的手机。测试结果显示，最诚实的居民来自测试中最小的城市——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。在这座只有 26.7 万人口的小城里，30 部手机当中有 29 部最终物归原主。

繁忙大城市里的居民的表现也丝毫不逊色。排在第二位的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、拥有 540 万人口的多伦多，共有 28 部手机被归还。多伦多一位 29 岁的保险经纪在归还手机后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如果你能帮助到别人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紧跟多伦多后面的是韩国首尔，有 27 部手机被归还；排在第 4 位的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，有 26 部手机被归还。斯德哥尔摩一位在购物街上捡到手机的地铁检票员表示：“每次在车厢里捡到手机，我都会给失主打电话。”

纽约、孟买和马尼拉并列排在第 5 位，那里有 24 部手机被归还。此外，巴黎和曼谷分别有 21 部手机被归还，并列排在第 14 位；伦敦和悉尼分别有 19 部手机被归还，并列排在第 21 位；莫斯科第 24 位（归还 17 部手机）；新加坡排第 25 位（归还 16 部手机）。表现相对比较逊色的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居民，在那里有 13 部手机物归原主，排在第 31 位。

测试结果显示，最后被归还的手机达到 654 部，归还率为 68%。测试还发现：带着孩子的家长更乐意为孩子树立诚实的榜样；女性归还手机的比例稍微高过男性；年轻人往往和年长的人一样诚实。



有了口福，才有幸福！

日本进口，优中之优
为您家庭，锦上添花

日本
產
米
JA
ANESE RICE